式之前,文人表达自我的首选自然是诗文词曲,但当他们完全熟悉小说这一文类之后,自然就逐步会有人采取这种文类来表达或抒发自我。至于这一时期为什么会是乾隆时代,笔者认为这其实具备很大的偶然性,并没有特定时代背景的原因在起作用。表达自我永远是人类的基本需要,而表达的手段自然会是一个时代最成熟的文类或艺术形式。用小说来表达自我,或者以“自况性”小说的形式来进行自我表达,在世界各国都不乏其例,尤其是 19 世纪的欧洲作家,比如狄更斯、歌德、罗曼·罗兰、福楼拜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有过类似的做法,而进入 20 世纪以后,由于人们对文学的个人化表达功能有了更强烈、更明确的认识,这便导致具备自我抒发性质的“自况性”小说的创作更趋于普遍了。

古代小说中的“当代史事”及其采择编演

潘 建 国
(北京大学 中文系, 北京 100871)

史事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素材来源,若按其时间界限,小说所叙史事又可分为“前代史事”和“当代史事”两大类。所谓“当代史事”,乃指事件的发生时间与小说的编撰时间同处一代,既包含两者时间间隔较短的“时事”“新闻”,也包括时间相隔相对较长但仍属同代的事件,本质上则均为本朝人写本朝事。惟事有大小巨细,写法也有正侧详略,且不同文体不同时代的小说作品,其关于史事的甄选裁剪以及敷演策略又有所不同。限于体例篇幅,本文拟择其要者,即专就通篇(而非局部)演绎“当代史事”的古代小说(以明清章回体及短篇话本体作品为主)及其素材的采择编演,略作探讨。

据文献记载,宋代说话表演中就已出现了演说当代史事的节目,时称说“新话”。宋末罗烨《醉翁谈录·小说开辟》有“新话说张韩刘岳”之语,此“张韩刘岳”指宋代抗金名将张俊、韩世忠、刘锜、岳飞。《梦粱录》卷二十记载了一位说话名家“王六大夫”,他“敷演《复华篇》及《中兴名将传》,听者纷纷”,此《复华篇》即《福华编》,讲述宋理宗宝祐四年(1256)鄂州军民抗击蒙古入侵故事;而《中兴名将传》大概就是抗金名将系列故事,其中自应包括“张韩刘岳”等人在内。此外,诸如《醉翁谈录·小说开辟》提及的《杨令公》、“收西夏说狄青大略”等,其内容也属于当代史事范畴。这些敷演本朝重大边事的时兴节目,素材鲜活,又因涉及家国民族问题,感慨系之,自然受人欢迎。

元代和明初似未见有“新话”作品传世。至明嘉靖以降,白话通俗小说逐渐兴起,编刊两盛。已知明代第一部演绎当代史事的通俗小说为《皇明英烈传》,叙皇朝开国史及诸元勋事迹,传闻为开国功臣郭英之后裔郭勋所撰,意在宣扬其祖功绩,以求进祀于太庙,编就后“令内官之职平话者,日唱演于上前,且谓此相传旧本。上因惜(郭)英功大赏薄,有意崇进之”(明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五),此传闻是否属实可置而不论,实际上,由于明代中前期政府抑制国史编修,朝野上下对于皇朝开国史事存在浓厚的兴趣,嘉靖时史学家陈建(1497—1567)鉴于“近日缙绅多喜阅国初之事”(明陈建《皇明启运录》卷八),乃以个人之力编纂私史《皇明历朝资治通纪》(简称《皇明通纪》)四十二卷,详细记录了洪武开国至正德时期约一百五十年的历史,此书成为《皇明英烈传》的基本史料来源,每每被“按”引于小说文本之中。可以说,《皇明通纪》与《皇明英烈传》皆是知识界顺应

收稿日期:2015-04-30
作者简介:潘建国,男,江苏常熟人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

社会读史热点而推出的文化产品,只不过文体不同而已。

《皇明英烈传》的问世,拉开了明代“当代史事”小说的编撰序幕,几乎每一次重大的社会事件,均会衍生出若干小说:譬如关于燕王朱棣靖难之役,有《承运传》四卷三十九回、《于少保萃忠全传》十卷四十回、《正统传》(佚)等;关于郑和出海事,有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》二十卷一百回;关于东南沿海抗击倭寇事,有《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》残存三卷、《胡少保平倭记》等;关于播州杨应龙叛乱事,有《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》六卷一百回;关于魏忠贤沉浮事,有《警世阴阳梦》十卷四十回、《皇明中兴圣烈传》五卷、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八卷四十回、《梼杌闲评》五十回等;关于天启山东白莲教起义事,有《新编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》六卷七十二回;关于辽东战事,有《辽东传》(佚)、《芦城平话》(佚)、《辽海丹忠录》八卷四十回、《镇海春秋》二十回、《近报丛谭平虏传》二卷十八则等;关于李自成吴三桂事,有《剿闯通俗小说》十回等,林林总总,编创不绝,颇为令人注目。晚明小说家对于“当代史事”的热情,延续到了清初顺康时期。其时国家虽已基本统一,但满汉民族矛盾较为突出,整个社会尤其是汉人遗民群体,尚未从易代的心理震荡中调适过来,对于他们来说,清初属于客观时空层面的“当代”,而明末启祯及南明时期,则具有主观心理层面的“当代”性,故诸如《新世弘勋》二十二回(实脱胎于明末之《剿闯通俗小说》)、《樵史通俗演义》四十回、《台湾外纪》三十卷(叙郑芝龙、郑成功抗清事)、《海角遗编》六十回(叙清军攻占常熟福山事)等作品,仍盛行一时。事实上,演绎明末清初史事的小说数量,恐远多于目前所存者,清末黄人(1866—1913)《小说小话》著录有《真英烈传》《鱼服记》《鸱鸮记》《正统传》《豹房秘史》《伟人传》《金齿余生录》《骖鸾录》《青词宰相传》《东楼秽史》《护国录》《辽东传》《甲申痛史》《陆沉纪事》《殷顽志》《鲸鲵录》《前后十叛王记》《毗舍耶小劫记》等小说,大概多属此类作品,惜今皆亡佚,其编刊年代和文本细貌也无从可考。

自康熙中后期以降,国家文化政策收紧,文网日趋森严,学术文化也转向考据实证,雍乾嘉道数朝,基本未见有专演“当代史事”的通俗小说作品问世;至咸丰年间,始有描述太平天国战事的《哀江南》小说六十回,以及描述贵州铜梓、铜仁地区平民起义的《玩寇新书》五十六回,可惜两书都仅存回目文字,并未真正刊行流播。迨于清季,中国社会进入近代转型期,国运沉浮,内忧外患,时事纷杂,兼之受到泰西文艺的影响,小说社会地位大为提升,故“当代史事”小说重又兴盛,陆续出现了诸如《扫荡粤逆演义》八回、《洪秀全演义》五十四回、《湘军平逆传》八回、《曾公平逆纪》八回、《国朝中兴记》四十回(以上叙太平天国事)、《左文襄公征西演义》三十二回(叙平定捻军起义事)、《邻女语》十二回、《救劫传》十六回(以上叙庚子事变)、《辽天鹤唳记》十六回(叙东北俄日战争事)、《台湾巾帼英雄传初集》十二回、《台战演义》十二卷、《中东大战演义》三十三回(以上叙甲午战争事)、《捉拿康梁二逆演义》四十回、《大马扁》十六回(以上叙康梁戊戌变法事)、《宦海潮》三十二回(叙袁世凯沉浮事)、《血泪黄花》十二回(叙武昌起义事)等一大批演绎近代军政事件的作品。

细审明清“当代史事”小说的发展简史,其在时间分布上有两个节点值得关注:其一,明代乃“当代史事”小说最为繁盛之期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透过明代小说史,庶可读到一部皇明“当代史”。究其原因,或与明代史学发展的特殊情况有关。洪武中期,太祖朱元璋下旨停修《起居注》及《日历》,其后历朝因循,令当代史编纂失去了基本的可靠的史料基础,导致所谓“国史之失职,未有甚于我朝者也”(明王世贞《弇山堂别集·史乘考误一》)的严重后果。国史正史的衰微,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私史野史的编撰热情,文人士子的史官情结和史家意识,颇获满足和施展之机会,遂“日事操觚,每遇所见所闻暨所传闻,大而缥缃之所纪,小而刍荛之所谈,辄即钞录”(明黄瑜《双槐岁钞·序》),故有明一代“野史之繁,亦未有多于今日者”(明俞应益《国榷·序》)。不仅如此,官修史书的缺位,也削弱甚至消解了史家著述定于一尊的禁锢,无论从资料的甄选编排,还是史论的立意口吻,明代野史皆有新的面貌,呈现出更为多元化、民间化和个人化的新特点,众声喧哗,歧异纷出,这与晚明思潮中所蕴含的追求个性的价值观

亦多所契合。在此过程中,传统史书与子书的学术边界变得更为模糊,前引陈建所修国朝当代史《皇明通纪》,其卷首“采据书目”中赫然列有《孤树裒谈》《水东日记》《可斋杂记》《灼艾录》《菽园杂记》《双槐岁钞》《寓圃杂记》《枝山野记》《病逸漫记》《震泽长语》《琅邪漫抄》《青溪暇笔》《庚巳编》等明人小说笔记杂著。与民间史学家“引小说入史”相呼应,小说家在编撰当代史事题材作品时,亦多具有明确的“存史”意识,所谓“盖将以信一代之耳目,非以炫一时之听闻”(明陆云龙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·凡例》第一则)、“秉史氏之笔而错以时务”(明文光斗《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·序》)云云,或许在他们看来,小说和私史野乘并无分别,皆为身处其中的当代人写当代事、纪当代史而已。事实上,“当代史事”小说确曾成为修史的资料来源,譬如清初计六奇所编《明季北略》《明季南略》就直接采录《镇海春秋》《新世弘勋》《樵史通俗演义》等小说中的文字①。其二,晚明和晚清乃“当代史事”小说编创的两个重要节点,前后遥相呼应。易代本为多事之秋,政权更迭,社会动荡,渺渺个人目睹时代剧变,不免慷慨激昂,口传笔录,兼之其时国力衰微,管控松弛,遂多野史稗官之作,亦不足为奇。

“当代史事”与书写者之间往往存在疏密不等的内在情感关联,这种“在场感”,使得小说作者并非仅仅充当历史知识的普及者,乃有机会直接参与到某一段“当代史”的记录和谱写之中。因此,“当代史事”小说素材的采择编演,与一般历史演义小说(即敷衍“前代史事”者)有所不同。

首先来看“当代史事”小说的素材采集。在没有网络、电视、广播以及公共报刊的年代,小说家如何搜集时事信息?据相关小说序跋凡例的记载可知,一般主要借助邸报、笔记野史及民间传闻三种途径。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“凡例”第三则云:“是书自春徂秋,历三时而始成,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,且朝野之史,如《正续清朝圣政》两集、《太平洪业》、《三朝要典》、《钦颁爰书》、《玉镜新谈》凡数十种,一本之见闻,非敢妄意点缀”,这里提及的是“邸报”和“野史”两种;《近报丛谭平虏传》作者“吟啸主人”又将小说资料来源分为“近报”(即邸报)和“丛谭”(即传闻)两类,全书凡十八则,则目之下逐一标明来历,分别有“邸报”六则、“丛谭”六则、“报合丛谭”(即邸报和传闻的结合)六则,这种均衡分布大概出于作者的人为设置,但也多少反映出了此类小说素材采集的具体情形。不同来源的素材,在小说文本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色彩。譬如“当代史事”小说中多有诏令谕旨、章表奏疏、揭帖告示、札牍檄文、殉难名单之类文字,身处社会底层的通俗小说家,实际上无法直接接触到这些军政资讯,他们正是从邸报中抄撮而得,又不厌其烦地将其引入小说文本,以便营造出一种宏大叙事所需要的历史氛围。至于民间传闻,则多津津乐道于重大事件的某些细节、侧面或者花边小道,《近报丛谭平虏传》中标注“丛谭”的六则文字,就有两则讲述了辽东战乱中庶民保持节操的故事,一则讲述了江湖大盗“传授”及弟子“何其仁”行窃故事,还有一则讲述了关帝显圣帮助守陵官军打退奴贼的故事,描写亦颇为生动。这些不载于邸报的“细故”,与邸报所载关于辽东战事的官方动态,恰可在小说情节层面形成互补,不仅如此,民间传闻体现了市井细民对于当代史事的理解、趣味和想象,本身就具有虚实相间、真假难辨的特点,故小说家很容易将自己的想象和虚构植入其中,从而在受限的历史叙事空间内拓展出文学叙事的空间。

再来看“当代史事”小说的素材择取编演问题。毋庸赘言,小说素材的取舍首先受制于作者拟定的文本主旨(这一主旨有可能反映了作者本人的立场,也可能是对社会或小说读者趣味的迎合)。不过,对于演绎“前代史事”以及“当代史事”的小说而言,主旨和素材之间的制约关系又有所不同。“前代史事”迭经时间的汰洗沉淀和史家学者的研考整理,已呈现出较为明晰的面貌,并形成若干权威文本(譬如历代官修正史、通鉴、纪事本末等类著述),小说家据史“按鉴”,敷衍成篇,虽亦有细节之虚构变异,但其主体面貌(包括

① 参见张平仁:《〈明季北略〉〈明季南略〉对时事小说的采录》,《文献》2004 年第 3 期。

事件始末、人物结局、甚至忠奸褒贬等等)却无法随意突破。而当代史事则不同,它们大多还处于歧说间出、纷繁复杂的原始状态,甚至事件本身尚未结束仍在演化中,因此,小说主旨对于素材择取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。以明末辽东战事为例,由于战事本身的胶着,信息传递的迟滞,加上朝廷党争双方对于边事的操控利用,时人关于辽东战事说法不一,尤其是袁崇焕和毛文龙的忠奸功过,更是云山雾罩,扑朔迷离。受此影响,不同小说文本中的毛文龙形象也大相径庭,浙籍同乡陆人龙所撰《辽海丹忠录》以及“吴门啸客”所撰《镇海春秋》,乃两部色彩鲜明的“颂毛”小说,誉其为不朽忠臣;而《樵史通俗演义》则反映了另外一种“贬毛”立场,称其冒功冒赏、跋扈不臣①。如此主题相背的两类小说,其所采择叙述的毛云龙辽战事迹,自然也会各自围绕着“颂毛”和“贬毛”展开,产生明显差异。实际上,即便对于相同的素材,甚至是同一位小说作家对于相同的素材,也可能因为主旨的不同,作出不一样的编演。譬如天启七年(1627)的锦宁之战,陆人龙《辽海丹忠录》第三十四回回目作“满总理宁远奇勋,赵元戎锦州大捷”,文本中反复以“打死鞑子不知多少”“(被杀)其余鞑子不可胜计,失亡马匹器械亦不可胜计”“寨里外鞑子不知打死多少”“(奴兵尸体)平地也堆得山一般似,城壕也几乎填满,城外鞑贼尸首也遍野”等词句,竭力渲染出这是一次“奇勋”“大捷”,回末陆云龙亦评曰:“锦宁之捷,足为中国吐气,令虏不敢正视。”但在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第二十七回中,陆云龙却又将锦宁大捷处理成一次无足轻重的战事:“(鞑子)只来锦宁两处掠些收不及的牛羊驴马,杀死几个走不动的疲老,烧毁几间草舍,骚扰了几日,却自回兵。锦宁城内,也便各处发兵追袭,也得五十余颗首级。”此两个文本描述的差异,恰好印证了明末野史关于锦宁之战的不同说法,也再次显示了小说主旨对于文本素材择取编演的巨大影响力:《辽海丹忠录》突出“大捷”,是为表彰毛文龙与辽东将士的协作及其所取得的赫赫战功;而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故作轻描淡写,则意在借此揭露魏党“纪太监”谎报军功、肆意封赏之罪,以服务于该小说批斥魏忠贤的主旨。就此而言,“当代史事”小说作者显然要比“前代史事”小说作者,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力和更为自觉的“以稗著史”意识,所谓“顾铄金之口,能死豪杰于舌端;而如椽之笔,亦能生忠贞于毫下”(陆云龙《辽海丹忠录·序》)。在某些作品中,这一权力更被放大到极致而构成话语“暴力”。譬如燕王朱棣借助靖难之名篡夺皇位,其合法性遭受质疑,遂有《承运传》四卷三十九回(存)、《正统传》(佚)等小说为其张目,不惜颠倒黑白,将方孝孺、铁铉、于谦等人塑造为元凶;晚明首辅温体仁为打击政敌郑鄤,乃指使门客罗织郑氏杖母奸媳等事,并编撰《放郑小史》四十回(佚)、《大英雄传》(佚)等小说以抹黑诬害之。小说乃沦为政治争斗和个人恩仇的舆论工具,清季黄摩西《小说小话》有云“明人小说以私怨背公理,是其积习”,甚是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除小说主旨之外,还有一个因素对于“当代史事”小说素材的择取编演,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,这个因素就是“时间距离”。当小说作者距离史事发生的时间越近,他就越陷于“当局者迷”的状态,一方面在情绪上慷慨激昂,无法做出冷静的观察和思考;另一方面,他能够获取的资料和讯息相对较少,对于史事的了解记录,往往是零散的、片断的甚至是错讹的。而当小说作者距离史事发生的时间越来越远,特别是等到相关事态尘埃落定,事件真相基本浮出水面,感情也趋于平静之后,他就有机会置身事外,或者登高望远,对于作品所演绎的史事作出整体的也是更为从容的把握。从小说文本的实际情况来看,时间因素至少可以带给“当代史事”小说三个层面的变化:

其一,事件的演进。譬如明末甲申(1644)之变后,“未及两月,即有卖《剿闯小说》一部”(明末清初姚廷遴《历年记》“崇祯十七年”),由于当时局势未定兼之南北信息传播不畅,这部《剿闯小说》的作者大概还不知道吴三桂已经降清,仍然在小说

① 参阅井玉贵:《历史上的毛文龙及其在时事小说中的反映——以颂毛小说问世之背景为考察中心》,《明清小说研究》2008 年第 3 期。

序文中对其大加称颂:"吴三桂舍孝取忠,弃家急国,效申胥依墙之泣,以遂秦哀逐吴之功,真正奇男子、大丈夫作用"云云,不知其后了解真相的读者阅之又作何感想？此外,《剿闯小说》原刻本(即周越然旧藏本)第八回录有"毗陵匡社友人"龚云起致钱谦益的长札,称钱氏"以文章道德为天下盟主",且将救国中兴之重任相期;可是甲申五月十五日,钱氏以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身份在金陵率诸臣乞降于清,震惊天下,终为千夫所指,此时若再读龚氏长札,真令人无言以对,故《剿闯小说》翻刻本(台湾"国家图书馆"及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)第八回,已将龚云起信札删去,代之以《左良玉上弘光帝疏》。小说文本在翻刻流播过程中,乃据时局变化而作出相应改动,这大概也可算作"当代史事"小说的一个独特现象。因此,在"当代史事"小说研究之中,应当更加重视同系列文本之间、同一文本不同版本之间的细节文字差异。

其二,情感的调整。譬如朱元璋军攻打苏州张士诚之际,伤亡甚众,故于张氏颇存芥蒂,明洪武七年(1374),苏州知府魏观欲将府治迁回曾为张氏改作宫室的旧址,结果被以"兴既灭之基"罪处斩,文人高启也因作上梁文腰斩于市,可以想象,假如明初人撰写演绎此段历史的小说,断不敢对于张士诚有任何同情美化之笔,但随着时间推移,情况发生了变化,成书于嘉靖万历间的《皇明英烈传》(虞虞斋藏明万历早期写刻本)卷五写道:

> 且说张士诚在军中,数日闭目不食,及至京师,舁入中书省。太祖欲待以不死,命丞相李善长出接之。李善长至,张士诚不为礼,李善长怒问曰:"张公平日以智勇自高,据土称王,近日何为至此?"张士诚曰:"只为天命有乖,力不能支,故被擒掳。"李善长曰:"汝知宋徽钦二宗,被金胡所掳,尚屈礼于胡官胡妇,况我乃中华圣主宰辅乎？吾之尽礼者,不敢自失其仪也。汝今不知天命,重己轻人,骄奢自恣,以至国破家亡,身为囚絷,而尚自矜高,乃自求速死之道。"士诚曰:"大丈夫如松柏之操,虽岁寒不改,岂可穷而自卑也。"善长拂袖出驿,登车而去。士诚见善长怒詈,恐不为太祖所容,自思:"田横齐之壮士,犹守义不屈,况我登王位之尊,而反拜于匹夫之下也！我非不能立国之罪,天之丧我,我何辞焉?"泪下如雨,至夜分自缢而死。

此处,张士诚虽为阶下囚,却等闲生死,不亢不卑,颇具品格,令人一掬同情之泪。相较之下,大明开国功臣李善长反倒显得心胸狭窄,令人不齿。这种情感褒贬色彩的微妙调整,自然也得归结于时间的力量。

其三重心的转移。譬如明末"斥魏"小说系列,按照其大致的成书时间,依次有《警世阴阳梦》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《皇明中兴圣烈传》《梼杌闲评》等四部作品,论者曾从"共时叙述"和"历时叙述"两个纬度考察了它们的异同,认为成书相对较晚的《梼杌闲评》是其中的集大成者,也是最成熟的。而《梼杌闲评》的成功,不仅得益于前三部作品的累积,更为重要的是,"随着时间的流逝,作者对同一事件的感受亦大不相同,从而有着与此前不相同的叙事目的,作者的不同创作目的影响着小说的叙事焦点"①,换言之,"斥魏"系列中的前三部作品,乃以小说文体记录历史事件,重心在历史;而《梼杌闲评》则是运用历史素材进行小说创作,重心在文学。

此处,又牵涉到一个与小说素材编演相关的叙事策略问题。无论是"当代史事"小说,还是"前代史事"小说,一般采用以历史叙事为主、文学叙事为辅的文本策略;历史叙事偏重陈述,意在存真,文学叙事则偏重描摹,意在求美。譬如《三国志演义》依靠历史叙事,有条不紊地展现了三国纷争的历史过程,波澜壮阔,气势恢宏;复又借助文学叙事,谱写了"三顾茅庐""千里走单骑""赤壁之战"等浓墨重彩的段落,细腻曲折,生动感人,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运用精当,相辅相成,共同造就了其小说经典的文学史地位。若进一步探究,《三国志演义》历史叙事的成功,乃得益于其参照《三国志》《通鉴》等史书"按鉴"的编撰方式,而其文学叙事的成功,除最后编订者罗贯中的文学贡献之外,与上述故事曾在书场舞台有过流

① 参阅成敏:《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研究》第三章之第三、第四节,北京: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,第 102—132 页。

播的事实也密不可分。可惜对于“当代史事”小说来说,《三国志演义》所能利用的这两种资源,皆已不复存在。“当代史事”小说是一种“超前于史籍编纂的小说创作”①,面对的或为零散的断烂朝报,或为歧说杂陈的野史传闻,或是尚在发酵中的真实事件,作者无法明辨真伪,理清脉络,掌握全局,娓娓道来,故其历史叙事往往给人以混杂、琐碎、断裂之感,兼受存史意识的影响,文本不加节制地引录各类历史信息(如诏令谕旨、章表奏疏、揭帖告示、札牍檄文等),以致招来其究竟是小说还是史料汇编的质疑。实际上,倘若不是依赖章回小说鲜明有力的文体外壳(分章标回),诸如《剿闯小说》《近报丛谭平虏传》《海角遗编》等作品,恐怕难以有效地组织成一部长篇小说。当然,当代人阅读“当代史事”小说,他们期待和关切的或许并非文学趣味,而是林林总总的史事信息,这也正是诸如《剿闯小说》这样文学性较弱的作品在当年却广受追捧、不断重版的原因所在。

“当代史事”特有的“在场”“切身”性质,使得小说作者和其编创的文本之间,总是充满了一种紧张感。这种紧张感既上升为上文所提及的强烈的存史意识,也转化成小说作者对于史事的迫切介入。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不惜在每回之前插入大段议论文字,凸显作者的论史之音,但这对小说文体外壳构成了一定损害,因为章回体前一回末多有套语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”,后一回首则紧接上文,揭开悬念,贯通情节,插入大段议论文字,则阻断了悬念的设与解、情节的顿与接,读来总有如骨鲠喉之感。而消释这种紧张感的方法,就是增强“当代史事”小说的文学叙事。如前所述,后出的《梼杌闲评》乃“斥魏”系列小说中最为成功的一部,它明显减弱了历史叙事的强度,大幅增加了文学叙事的分量,关于魏忠贤入宫前神秘人生的演绎,长达二十回,占据了全书五分之二的篇幅,这些情节内容大多出于作者的想象。最为关键的是,作者虚拟了一个蛇精因果报应故事,藉此确立小说的整体框架;又添加了若干细节和次要人物,将魏忠贤入宫前后的生活以及魏氏与其他重要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,有效地勾连起来;小说甚至还增设了“夜明珠”这一功能性物象,让它闪现于故事的不同段落,发挥凝聚结构的作用。通过这些努力,《梼杌闲评》获得了其他“当代史事”小说罕有的连贯性和整体感,文学叙事所产生的效应,不仅弥补了历史叙事的不足,也给小说带来了作为文学艺术应有的色彩和气息。事实上,在将当代史事“文学化”的道路上,还有一部作品比《梼杌闲评》走得更远,它就是《七曜平妖全传》,该书纯以神魔小说笔法,叙写当代史事,竟将天启年间政府军平定山东徐洪儒白莲教起义之事,演绎成为正邪两方的妖法相斗故事,郑振铎曾惊叹道:“今徐洪儒事,发生不满三载,战血方腥,书中人犹多健在,而已被写得幻变至此,实为奇事。”②而作者在文本中透露出来的谐谑色彩,更增添了这部小说的文学独特性③,值得关注。

《梼杌闲评》和《七曜平妖全传》的文学实践,似乎启发我们:如果“当代史事”小说作者,不拘泥于存史,不把当代史事作为“史事”而是作为“故事”来进行编演,那么,小说家的文学想象就有了用武之地,小说文本也可以呈现出更具文学性的面貌。但实际上如此之后,“当代史事”小说的历史价值,将会遭受很大削弱,甚至其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独特意义,也有随着小说家“消费”历史的过程而被消解的危险。因此,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并非只是叙事方式的差别,其背后隐含着“当代史事”小说两种不同的文本价值,即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,而生活在不同时间节点中的作者及读者,对此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。或许,如何协调平衡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关系,并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状态,乃是以史事为素材的小说创作中一个永恒的话题。

(本栏责任编辑　管　琴)

① 参阅欧阳健:《超前于史籍编纂的小说创作——明清时事小说新论》,《文学遗产》1992 年第 5 期。

② 郑振铎:《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》,收入氏著《中国文学研究》下卷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,第 453 页。

③ 参阅成敏:《以神魔写时事——论〈七曜平妖全传〉》,《明清小说研究》2006 年第 1 期。